

文学春潮激荡老城

汪军



1921年9月，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光明甫委托上海泰东书局总经理赵南公推荐一名教员，赵南公将这个�会给了郭沫若，郭沫若因要赴日本，遂转给了英文基础甚好的郁达夫。关于郁达夫在安庆法专所教课程，郭沫若自传中称是英文，郁达夫日记则记为欧洲革命史，说法不一。与郁达夫轮换教授同一专业的易君左回忆，他们教的是政治史。查阅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编制，分预科、本科，本科又分法律科、政治经济科，政治经济科的选修课有政治史。民国时期高校讲授西学，须有英文基础，有的甚至直接用英文授课。故郭沫若所说的英文，是泛指西学课目，而郁达夫所说的欧洲革命史，则是政治史的一种浪漫说法。郁达夫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易君左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授这门课是完全合格的。

上海泰东书局孕育了创造社，因赵南公与光明甫的关系，泰东书局编辑李风亭、易君左和郁达夫，都曾到安徽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在安徽安庆教书的同时，遥领泰东编辑”。据易君左回忆，他和郁达夫在安庆教书期间，像打更的一样，一个打前半夜，一个打后半夜，“他教第一学期，我教第二学期；他教第三，我教第四”，两人轮换，往返上海与安庆，兼顾泰东及创造社事务。曾任教于法专的陶希圣在《江风塔影》中回忆：“每星期日，法专与第一中学两处的友人集会于迎江楼，或大观亭聚餐。法专有曾伯猷、冯若飞、胡幼吾和我，一中有易君左、郁达夫诸人。”这种记忆的误差，可能是郁达夫教选修，且与省立一中学生张友鸾走得较近，经常给一中学生社团举办讲座，而陶希圣、曾伯猷等人教的是本科法律，故在校内鲜有交集。

20世纪二一十年代，乍暖还寒的早春，如十二消息卦之复卦，重重阴霾之下，一根新生的柔弱的阳爻。郁达夫创作的“日本-A城”系列便是这个时代的言语者。“雪后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银灰色的死》开篇这句话奠



民国时期安庆城南圣教主座堂一带建筑。

定了“日本-A城”系列的基调。1923年秋郁达夫赴京教书，作《离散之前》，亦是其时代的终结。郁达夫创作的“A城系列”包括：直接以A城为背景的《茫茫夜》《秋柳》《鸢萝行》《迷羊》；《茫茫夜》《秋柳》主人公“于质夫系列”，《怀乡病者》《空虚》《离散之前》；创作于A城的《孤独》《春潮》。此外，亦有易君左《塔影》、陶希圣《江风塔影》、苏雪林、叶灵凤等人的多篇作品，“A城”可谓新文学一个地域性符号。民国时期的安庆是新文学的福地，陈独秀、程演生、方令孺、宗白华、张友鸾、邢公畹出生在这座城市，易白沙、苏曼殊、周越然、成舍我、张恨水、苏雪林、郁达夫、易君左、朱湘、庐隐、陆侃如、冯沅君、饶孟侃、刘大杰、叶灵凤、钟鼎文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现代文学名篇《海滨故人》以这座城市为背景，郁达夫创作的“A城系列”则是这座城市另外一个生命。

郁达夫创作的“A城系列”始于1922年5月《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的《茫茫夜》。在1923年9月第一卷第四号上，出现了《迷羊》即将出版的预告，归于《创造社丛书》且注明已在“印刷中”。郁达夫日记表明，《迷羊》并非在初稿基础上修改而成，郁达夫

于1926年才开始《迷羊》的准备和创作，写了一年多，1927年12月29日完工，北新书局初版于1928年1月。所以，《创造》第一卷第四号《迷羊》的预告，并非五年后出版的《迷羊》。

1924年12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茫茫夜》的续篇《秋柳》时，郁达夫还写了一篇小序，开头写道：“《秋柳》是《茫茫夜》的续篇，系两年前（1922年7月）在东京时作成的，正在作《风铃》之后的两三天内。这篇东西的广告，在没有作成之前，已在《创造》（季刊）第一期里登

过，但后来因为觉得完全不满意，终究没有发表。”查阅《创造》季刊，创作于《秋柳》之前的《风铃》发表于第一卷第二期，而整个第一卷的第一到第四期上，都没有发现《秋柳》的广告，只有第一卷第四期上的《迷羊》的广告。因此，可以认为，郁达夫所说的《秋柳》的广告，实际上就是《迷羊》的广告，《迷羊》是《秋柳》最初的名字。而离开安庆三年多后开始创作的《迷羊》，则借用了《秋柳》的原名，主人公也从于质夫换成了王介成。

从篇名来看，《迷羊》作为《茫茫夜》的续篇也很合适，茫茫夜中的迷羊，体现出五四后一代青年觉醒后却一时无路可走的苦闷心理。迷羊出自《圣经》中一个著名的故事，《马太福音》18章：“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一个都不能少，忏悔、赦免、救赎，回到神的身边。1920年苏雪林曾翻译《迷失的羊》，刊于《女子周刊》。可见，迷羊这种文学意

象，也是当时青年寻找人生出路的普遍心理的写照。

郁达夫何以将篇名从《迷羊》换作较为平实的《秋柳》？故事发生地A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在北门城墙外，从学校沿城壕到菱湖公园，一路都是柳树，在秋阳下蓬勃生长，给郁达夫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小说中亦有精彩的描述。而《迷羊》更名《秋柳》，源于郁达夫心中已在酝酿的更大的写作计划，这个A城故事更适合迷羊所呈现的意象——忏悔、赦免、救赎。《迷羊》最早的评论者，有刘大杰和邵洵美，其评论刊于《当代中国作家论》，1933年6月由上海乐华图书公司出版。刘大杰的评论透露出几点信息：“在四年前的武昌，《迷羊》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有一《迷羊》的腹稿。”这也再次证明，《迷羊》是一部全新的作品，《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广告中出现的《迷羊》，只是《秋柳》的原名。“作者在《迷羊》里面写出来的东西，在《迷羊》以前的作品里，都已写过了。情感是以前的情感，作风是以前的作风。千篇一律，一点也没有两样。读《沉沦》，读《秋柳》，读《迷羊》，真分不出前后，真分不出新旧。我们对于文学家的要求，时时望他给予我们新生命的作品，《迷羊》不是新生命的表现，乃是旧情感的遗留。”刘大杰所抱怨的，恰恰是《迷羊》最可贵的：郁达夫决然地告别所谓时代精神，重回心灵故园，沉醉“旧情感的遗留”，续写A城往事。

七八年后，省立安徽大学建校，邀请郁达夫任教文学院，他接到电报后，也许是怀着对安庆青春时期的感情，毫不犹豫地上海坐船到安庆，重临旧地，时间是1929年9月29日。郁达夫住在百花亭省立安徽大学东北城墙下的宿舍，“午前十一时到安庆，遇政变兵变，受了不少的惊慌。午后三时才到百花亭安徽大学内住下，人倦极，作上海信一封”。此后一周，都是在追寻多年前的A城往事中度过，可谓怀旧之旅。“午前在街上空跑了半天”“中午在清真馆吃中饭”“晚饭后，携同学数人，上东门城楼去走了一圈，倒很想起了《茫茫夜》里的一些描写”“午后出去跑到了晚，晚上去看了半宵的戏，到午前一点才上床睡觉”“出外去走到了午后”。离开前的晚上，“约旧友两人吃晚饭，谈到十年前旧事，黯然神伤矣”。郁达夫上一次是1921年秋天到菱湖之畔法政专门学校任教，相距整八年，郁达夫对A城的追忆跨越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故其言“十年前旧事”。

(上接A5版)

《新青年》早期作者群，以清末民初省垣安庆文化教育界人物居多，如陈独秀、潘赞化（瓚华）、易白沙、光明甫、方守敦、李寅恭、李张绍南、高语罕、高一涵、李次山、程振基、刘文典、王星拱、程演生、蔡晓舟，这是他们以《新青年》为中心的第三次集聚。第一次是1902年安庆藏书楼演说，创办青年励志学社，包括陈独秀、潘璠

华、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张伯寅；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前后，从《安徽通俗公报》《安徽船》到青年军，包括韩衍、陈独秀、陈白虚、易白沙、孙养癯、朱蕴山、高语罕、高一涵、成舍我。青年励志学社、青年军、《新青年》，这三次集聚，都冠以“青年”名号。他们也留下了不少有关安庆的著述和文章，如高语罕《百花亭畔》、李寅恭《安庆市政问题》、高一涵《皖江见

闻记》等。由皖江小传统到《新青年》大舞台，这是皖江文化的一个重要话题。实际上，民国元年（1912）以《安徽船》为中心，《青年杂志》作者群已经完成了集结，包括韩衍、陈独秀、易白沙、高语罕。青年军人字旗，其设计为白底，上下各一道红色横条，象征天与地，中间用红色书写“人”字，寓意顶天立地。柏文蔚督皖，韩衍遇刺，青年军解散，人字旗被焚。

高语罕说，假如韩衍在五卅时代仍健在，文学革命急先锋一定不止陈、胡二人。《青年杂志》这一作者群，可视作晚明泰州学派颜钧、何心隐、罗汝芳、李贽的整体复活，“百姓日用即道”的平民情怀，“赤手搏龙蛇”的狂野气象，构成新文化运动最原始的推动力。何以在皖江聚合成这股不羁的气流，除岳王会、青年军的淬炼，亦有经世致用桐城理学之背景。